

程工 刘丹青 主编

汉语的 形式与功能研究

FORMAL AND FUNCTIONAL STUDIES
IN CHINES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语的形式与功能研究

刘丹青著
ISBN 978-7-100-05923-3

程工 刘丹青 主编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3301号

商务印书馆

卡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05923-3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的形式与功能研究/程工,刘丹青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ISBN 978-7-100-05952-7

I. 汉… II. ①程… ②刘… III. 汉语—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33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YŮ DE XÍNGSHÌ YŮ GÖNGNÉNG YÁNJIŪ

汉语的形式与功能研究

程 工 刘丹青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952-7

2009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33.00 元

前言

2006年4月22—24日,春色正浓的郑州迎来了汉语语言学界的一件盛事:首届汉语形式与功能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此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创意特别、立意深远。其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为庆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徐烈炯先生七十寿辰而召开的大会。众所周知,虽然徐先生的大部分研究都根植于形式语言学理论,但他本人在功能语言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心得,并且提出了两大学派之间不但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观点。鉴于此,本届研讨会旨在作出一些尝试,为两派学者构筑一个沟通平台,使其消除“门户之见”,共同促进汉语语言学的健康发展。

徐烈炯先生自上世纪70年代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此期间,徐先生为语言学特别是形式语言学在我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徐先生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发挥着学术中坚和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是较早学习和借鉴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国内学者之一,在引介生成语法理论以及现代语义学理论方面更是走在了国内其他学者的前面。他在语言学研究中取得了令人赞美的成果,先后出版了《生成语法理论》、《语义学》和《当代国外语言学:学科综述》三部颇具影响力的语言学专著,独立或与他人合作编写了《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上海方言语法研究》、《话题的结构与功能》等十余部举足轻重的著作。不但在《中国语文》、《当代语言学》(原名《国外语言学》)、《外语教学

与研究》、《外国语》等国内语言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更有二十多篇学术论文见诸 *Language*、*Linguistic Inquiry*、*Linguistics*、*Lingua* 等国际一流语言学期刊或学术文集。除此之外，徐先生还有大量译作、书评等问世，甚至对外国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的译注、校订等工作都有涉猎，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徐先生先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湖南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职，还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等多所世界知名院校担任访问学者，现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名誉教授。徐先生长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语言学研究人才。虽然身在海外，却时刻心系国内语言学的发展和人才梯队的培养，经常到香港、湖南等地的院校讲学，把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和独到见解毫无保留地与他人分享。徐先生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必将成为激励年青一代语言学者投身语言研究的动力。

作为当今语言学界的两大流派，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的纷争由来已久，其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承认语言或语法系统的自治性上。形式主义认为，语言系统具有自主性，独立于意义和功能系统而存在；功能主义则认为，语言研究不能脱离意义和功能，需要考虑语用、语境和认知等非语法因素对语言结构的影响。简言之，形式主义提倡自主的语言观，而功能主义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两派之间的这种对立曾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然而近年来，这种对立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一方面，形式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功能学派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中的例外情况；而功能主义学派中也有研究者开始借助形式化手段来探讨语言结构。诚如徐先生在《功能主义与形式主义》（《外国语》2002年第2期）一

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绝对的,两个学派之间应该相互学习、互补长短。可见,增进两大学派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既是徐先生本人的一大夙愿,也顺应了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我们欣喜地看到,由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发起并承办的这次大会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会议不但收到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更迎来了形式与功能两大学派的七十多位海内外知名学者。大家齐聚一堂,探讨学术问题、交流研究心得,为两派之间的互解与交流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为使这种交流和沟通得以延续,为了纪念这次盛会,我们特地从参会论文中遴选出三十篇,刊印成论文集,以飨广大读者。

巧合的是,研讨会的举行正值谷雨时节,而谷雨正是播种的季节。希望这次研讨会播下的种子能在中国语言学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结出累累硕果。

论文的征集和编辑工作由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刘丹青先生合作主持完成,参加编辑工作的有我的几名博士生安丰存、杨大然、熊建国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唐正大博士、陈玉洁博士(现在浙江大学)和博士生强星娜。徐烈炯先生本人参与了论文的审阅。会议的举办和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资助,我向参加会议、提交论文及为论文集的成功出版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编辑和出版本书的商务印书馆深切致谢!

程 工

于 2007 年 9 月

目 录

中国与东亚的语言和基因	贝罗贝 (Alain Peyraube)	1
儿童语言发展按照提示强度之模型:		
普通话、粤语和日语之专用量词发展(英文)	Mary S. Erbaugh (艾玛丽)	19
话题句的形成	邓思颖	36
话题优先的句法后果	刘丹青	50
新加坡英语主题句	包智明	72
焦点与量化	胡建华	83
复数名词短语的指称和“都”量化	郭 锐 罗琮鹏	92
“每 NP”的分布限制及其语义解释	潘海华 胡建华 黄瓚辉	110
梯级模型与“都”的语义刻画	蒋 严	123
LF 复制途径与汉语截省句的意义重建	刘丽萍 方 立	133
长短“被”字句之争	石定栩	147
再论小句补语句的结构及语法意义	张 璐	166

用构式的理念来透视 V + NP 等结构	熊学亮	186
复杂名词短语(不)可接受性语义析因	杨彩梅	203
汉语不定名词关联结构与驴子句	文卫平	217
英语假部分结构与汉语量词结构的句法同一性	程 工 梁 燕	241
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的语感调查	王培光	255
生成语法中空语类原则的发展及汉语中的空语类	邢 欣	267
最简探索框架下寄生语缺的生成研究(英文)	姚淑超 李白清	278
汉语提升动词初探	阎 勇	296
汉语对空间静止位置关系的两类虚拟运动	张旺熹 姚京晶	305
“时”“体”范畴的本质及其蕴涵共性	金立鑫	322
“不”的使用和情态的关系	沈 园	346
普通话基本语气词的主要特点	左思民	357
网上实时聊天的篇章分析	徐赳赳 许家金	373
WH 构词范式、反片段性,及汉语“任何”的二语习得	花东帆 曾 莉	394
普通话名词性“的”的儿童语言习得	吉孙菁 杨小璐	413
汉语动结式复合词的语言习得	徐艳琴 杨小璐	433

汉语的部分重叠和完全重叠·····	李 兵	隋妍妍	454
汉语浊塞音声母清化的优选论分析·····	王茂林	宫 齐	476

* * *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机制

——兼说汉语“糅合”造句·····	沈家煊	488
领有名词移位与偏正结构切分的层次和方向·····	徐 杰	492
汉语话题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范开泰	494
“是……的”的构件分析·····	熊仲儒	496
从状中结构看汉语的自然焦点结构化·····	玄 玥	501
结果补语小句分析和补语小句的内部结构 ····· Rint Sybesma	沈 阳	506
反指零形主语小句的篇章地位和句法属性·····	方 梅	511
无定主语句的篇章解释····· 张伯江	刘安春	517
“动+介+宾”结构的语义模式及认知场景 ····· 邵敬敏	周 娟	521
关系化对象与关系从句的位置 ——基于真实语料和类型分析·····	唐正大	526
“如果说……”和“与其说……”·····	张宝胜	530
接应代词的约束问题·····	顾 钢	533
联系项原则与“里”的定语标记作用·····	陈玉洁	536
论吴语宁波方言和苏州方言的前高元音的区别特征 ——兼谈高元音继续高化现象·····	胡 方	540

中国与东亚的语言和基因

贝罗贝 (Alain Peyraub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在商代,中国境内居住着说汉语的汉语族群,同时居住着非汉语族群。我们并不能确知这些非汉语族群是些什么人,同时,关于汉语来源的证明仍然贫乏且有争议。^①

遗传基因的历史能否有助于我们在了解人口分布的同时,也了解距今五千年前的汉语的情况?

语言和基因的历史不同。可是,达尔文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经指出,人类进化跟语言进化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平行对应关系。

语言和基因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进化过程,前者主要是文化的,后者是自然的,同时它们的起源和再生机制也不同,但是它们的传播机制确实明显类似,比如都有:突变 (mutation)、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迁移 (migration) 和机遇 (chance) [遗传学上称漂移 (drift)]。(Piazza 1995) 由于这些类似传播机制的存在,学者们寻找遗传进化和语言进化的一致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 遗传距离与语言距离的相互关系

人口遗传学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人种的遗传变异的系统研究,重建现代人类从起源以来的历史。近二十年来,他们致力于将遗传距离(人口遗传学的中心概念)与语言距离联系起来。结果

是:随着生化和分子技术的发展,遗传学资料大增。这方面的研究有一百多项,以下是最重要的几项:Greenberg et al. (1986) 关于美洲人群的研究;Excoffier et al. (1987) 关于次撒哈拉非洲 (Sub-Saharan Africa) 的研究;Sokal et al. (1988)、Barbujani et al. (1990) 关于欧洲的研究显示出欧洲人群的语言联系在维持及可能引起遗传差异方面扮演重要角色;Poloni et al. (1997) 关于欧洲及非洲不同人群的研究;Cavalli-Sforza et al. (1988) 现在已成为经典之作,他们建立了一个世界人口谱系树,该谱系树包括 42 个族群,代表世界上的原住民。^②

上述最后一项研究的遗传资料来自对呈现标准 (即非 DNA 的) 多态性 (polymorphism) 的基因频率的大量采集。他们研究了 120 个等位基因 (alleles), 显示语言超级大家族与大部分的等位基因组有明显的一致性,表现出一种他们称为的“遗传进化与语言进化之间的相当大的平行关系” (6002 页)。

大部分 (假如不是全部) 这方面的研究中,遗传学家采纳的语言假设是 Greenberg、Ruhlen 及/或俄罗斯“统一主义者” (unificationists) 提倡的大语系假设。^③ 这种倾向很有可能起因于遗传学家取样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较大,同时也由于基因频率在局部的变异较低。

但是,后来的很多研究推翻了所谓的“人口遗传分类与语言分类之间存在无可辩驳的对应关系”。Cavalli-Sforza 自己承认遗传距离与语言距离的关联非常弱。他在 1988 年谈及的“相当大的平行关系”后来变成了“语言家族与人类遗传历史之间的某种非任意的联系” (Cavalli-Sforza et al. 1992 : 5623)。可以举出两个有名的在高加索的语言的例子来说明二者之间并无关联。第一个例子涉及亚美尼亚人和阿泽尔人 (Azeri), 他们在遗传上非常接近,但

说完全不同的语言（前者说印欧语而后者说阿尔泰系语言）。第二个例子涉及车臣人和印古什（Ingush）人，他们说属于北高加索语系的东北高加索语支的非常接近的语言，但在遗传上区别很大。（Nasidze et al. 2001, Nasidze et al. 2003）

如果说关于基因变异的最早研究是通过对多态性在表现型（phenotypical）层次（即基因产生的层次）的分析而间接完成的话，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多态性的分析主要在于 DNA 层面，这种做法比较复杂但是采用了直接的方式。^④

线粒体 DNA（Mitochondrial DNA，由母亲所传）和 Y 染色体（完全来自父亲）由于有高复制数目、明显缺乏重组、高替代率及母亲或父亲的遗传型几种特性，被证实是了解人类进化的有效工具。很多时候，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的分析结果相似，但在一些实例中，似乎男人和女人在人类族群组成方面所作贡献的方式并不相同，非洲说一种科伊桑（Khoisan）系语言的达马（Dama）人就是这种情况。这一族的人有相同的线粒体基因，但在 Y 染色体方面，他们和尼日尔－刚果（Niger-Congo）语族〔属尼日尔－科尔多凡（Nigero-Kordofanian）大语系〕的各人群也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参见 Dupanloup et al. 2002）

因此，在目前，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有各种假设，但都没有十足的把握。随着人口遗传学数据的大量积累，情况变得越来越不简单；再者，在历史背景下解释遗传数据所必需的进化理论模式仍在细化，这也使得情况更加复杂。

二 东亚及东南亚的情况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及东南亚的情况又怎样呢？可能更加混乱。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传统方法仍然是把这一区域的语言分成以下 6 个语系:

1. 汉藏语,可追溯到公元前 4500 年左右。它有两个分支:藏缅语和汉语。Wang (1996) 估计汉语诸语言在距今 6000 年前左右从藏缅语中分离出来。这个年代也是 Chang (1986:234) 所认定的“原始中国”的形成时期,当时,各种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各处开始出现。

2. 南岛语,可上溯到公元前 4000 年。

3. 南亚语,可上溯至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4000 年。

4. 傣-加岱语 (Tai-Kadai),可上溯到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

5. 苗瑶语,可上溯至公元前 500 年。

6. 阿尔泰语。

现在一般都同意(虽然不是普遍接受)汉语诸语言及方言在遗传上与藏缅语有关,二者构成汉藏语系的一支。然而,除开这一点,再很少有一致的意见。大家现今正讨论用大语系 (macro-family) 来概括这些不同语系,其中的大部分假设早些时候就已被提出过。在过去几十年中,提出的假设主要有 6 个:

1. 南方 (Austric) 语系,是南亚语和南岛语的结合。由 Schmidt (1905) 提出,Reid (1994) 支持此提法。一些人认为苗瑶和傣-加岱语也属于南方语系。(Ruhlen 1997)

2. 澳泰 (Austro-Thai) 语系,包括南岛语和傣-加岱语。由 Schlegel (1901)、Benedict (1942, 1975) 提出,Ostapirat (2005) 支持这一提法。苗瑶语亦通常包括在内。

3. 汉-南岛 (Sino-Austronesian) 语系,后发展为汉藏-南

岛语,包括汉藏语和南岛语。由 Conrady (1916) 提出, Sagart (1994) 支持此说。

4. 汉-印欧 (Sino-Indo-European) 语系,包括汉藏语和印欧语。由 Pulleyblank (1995, 1996) 提出。他注意到这些语言在语音和形态上有深层对应的痕迹,只能用同源来解释。如果它们真的有关联,它们还是单一群体的时代一定非常久远,远在原始印欧语系之前。

5. 汉-高加索 (Sino-Caucasian) 语系,包括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 (Yeniseian) 语。由 Starostin (1989, 1995) 提出,该理论可追溯到 Donner (1916)。纳-德内 (Na-Dene) 语曾被归入汉-高加索语,所以这个大语系长时被称为德内-高加索 (Dene-Caucasian) 语系。

6. 原始东亚 (Proto-East-Asian) 语系。这个超级大语系由汉藏-南岛语系和南方语系组成,包括苗瑶语系 (属南方语系) 和傣-加岱语系 (属南岛语)。由 Starosta (2005) 提出。距今 9000 年前或更早,中国中原地区 (汉江至黄河一带) 可能说原始东亚语。

为什么意见如此分歧? 这是因为要把在这个广阔地区内说过的不同语言相互接触而产生的影响从因内部发展而产生的影响中剔别出来,是极度困难的,也就是说,要把横向传播的影响从纵向传播的影响中区分出来,非常困难。因此,很难偏向于某一个说法。每一个支持上述假设的人都有一些力图证明自己的论证。^⑤

基因研究可否帮助我们认定其中的一个假设?

最早的一项重要的中国人口遗传分析研究了中国 74 个人群的免疫球蛋白 (immunoglobulin) 的两种异型 (allotype) Gm 和

Km (“传统的”标记)的分布。参见 Zhao & Lee (1989) 及非常重要的一项研究 Zhao et al. (1991)。这两篇文章指出应该区分南方和北方汉人,二者在遗传方面有不同,分界线在北纬 30 度。

至少根据基因分析,中国南方人与东南亚人有更大的亲缘关系。在南北这个大分区内,遗传研究亦显示所谓的汉族人并不自成族群,而是跟其他共处的少数民族组成族群。换句话说,汉族是一个文化性而非生物性的群体。

此外,跟中国境外 33 个其他族群的比较显示北方汉人可能属于包括阿撒巴斯卡人 [Althapascans, 说北美洲属德内 - 高加索 (Dene-Caucasian) 大语系的纳 - 德内 (Na-Dene) 语]、爱斯基摩人 (因纽特人)、日本人、朝鲜人和蒙古人 [说属于欧亚 (Eurasian) 大语系的爱斯基摩 - 阿留申语 (Eskimo-Aleut) 或阿尔泰语] 的一组。相反,南方汉人更接近泰国人 (说傣 - 加岱语)、越南人 (说南亚语),或者甚至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 (二者说南岛语),即更接近于说南方 (Austric) 大语系语言的人。

Chu et al. (1998) 也研究了中国 28 个人群的遗传面貌,支持区分南方人和北方人,后者是两系的 (biphyletic)。再者,种系的发展 (phylogeny) 显示现今居住在东亚的人的祖先很可能是从南中国进入的。最后,遗传上的证据并不支持在中国的智人 (*Homo sapiens*) 有独立来源的说法。

Su et al. (1999) 收集了中国 21 个少数民族的 DNA 样本。[该课题是一个大课题“中国人基因组 (genome) 的多样性”的一部分] 其中汉人的样本从 22 个省份收集而来,用的是 Y 染色体双等位 (Y-chromosome biallelic) 标记。他们证实了南北的区分,同时推断北方人源自南方人。他们的数据显示东亚的南方人群比

北方人群多形态 (polymorphic) 得多, 北方人只有南方单倍型 (haplotypes) 中的一个次类。这个模式很可能显示东亚的现代人最早是在东南亚大陆定居, 时间是最后的冰河时期 (5 万至 10 万年前), 他们从那里向北扩展至东亚的其他部分、中国北部甚至西伯利亚。

Ding et al. (2000) 研究了三个人类遗传标记系统, 然而, 在这些标记内并未找到支持南北大区分和东北亚人源于南方的证据, 相反, 这些标记模式显示出纯粹由距离引起的隔离。在线粒体 DNA 多样性图中, 他们发现南方一些人群, 譬如傣族, 与其他北方人更相似而不是跟其他南方人——如越南人——相似。被设想的南北两支人群似乎在一个渐变群 (cline) 内混合, 其间并没有突然的变化。他们断定: 东亚地区没有一定之型, 表明很多以前用来界定普遍的地区性分别的人类学趋向实际是文化现象, 并不涉及遗传上的区别。

Yao et al. (2002a) 研究和比较了中国几个省份的汉人线粒体 DNA 的差异。显示汉族人有明显的地域区别, 这一点可从单倍型组的频率 (haplogroup-frequency) 数据图上看到。从一些单倍型组 (F1、B 和 D4) 的频率中观察到的由南至北的渐变跟中国人群免疫球蛋白 GM 异型的分布极为相似。(Zhao & Lee 1989) 然而, 把不同的汉人只分成“南中国人”和“北中国人” (Su et al. 1999) 或用一两个地区的人群来代表所有的汉人并不能适当地反映出汉族人的遗传结构。令人感兴趣的是, 尽管从青铜时代到现在, 有大量人口迁移的历史记录, 以及大量横跨中国的基因流 (Ge et al. 1997), 地域间的区别仍保持了下来。中国南部和西南部, 地区分别比较明显: 南部和西南部的人比中部、东部和东北

部的人呈现出更多样的模式。Yao et al. (2002a) 推断: 中国的先民在距今 6 万年前左右由东南亚移居而来, (如同 Su et al. 1999 的设想) 这是可信的; 但从那时到晚冰川极盛期 (Late Glacial Maximum, 约 5 万年前) 之间这一长时期内的人口动力方面的问题仍有待考量。南北基因库的不同可能源于这一时期。后来的迁移可能使这一早期分别有点模糊不清, 因为中国中部的基因库具有南北两库的线粒体 DNA 的特征。

Xue Yali et al. (2003) 研究了 MYS2 多态位 (MYS2 polymorphism) 在中国 26 个人群中的分布, 结果显示南北人群在基因结构方面确有不同。南北之间的地域区分由此而确认。同时, 中国北部亦显示出东西人群之分。

He Hui-qin et al. (2003) 用分子生物技术分析了古代人骨 (来自新疆哈密地区五堡古墓) 线粒体 DNA D 环高变区 (D-loop high variable region) 的多态性, 结果显示古墓里有黄种人和欧洲人, 他们可能在 3200 年前共处于新疆哈密。

Quintana-Murci et al. (2001) 指出: 在西南亚, 地理分布、观察到的渐变群 (cline) 和 HG-9 及 HG-33 染色体的估算年龄, 都支持一个人口扩散模式, 即早期的农夫由伊朗西南部、游牧民由西亚及中亚进入印度, 把基因和文化 (包括语言) 传播到西南亚。虽然可能另有更复杂的解释, 但这些人种的现代雄性特异性 (male-specific) 基因库的分析表明: 人口的迁移和混合等大事件, 伴随这些重要的历史和语言事件。

至于东亚及东南亚, Poloni et al. (2005) 是一项新的关于 GM 系统和猕因子 (rhesus factor) 的研究, 显示南亚 (Austro-Asiatic) 族分歧最大, 其次是汉藏族。^⑥相反, 傣-加岱族和南岛族